



还原

脂砚斋

二十世纪红学最大公案的全面清点



欧阳健

著

黑龙江教育出版社

还原脂砚斋

——二十世纪红学最大公案的全面清点

欧阳健 著

黑龙江教育出版社

2003年·哈尔滨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还原脂砚斋:二十世纪红学最大公案的全面清点/欧阳健著. - 哈尔滨:

黑龙江教育出版社,2003.4

ISBN 7-5316-4124-0

I. 还... II. 欧... III.《红楼梦》研究

IV. I207.4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19066 号

随书赠送光盘一张

录有甲戌本、己卯本、庚辰本三种脂本的全部脂批

还原脂砚斋

——二十世纪红学最大公案的全面清点

著 作 人 / 欧阳健

责任编辑 / 程俊仁

技术编辑 / 付 辉

封面设计 / 姜立新

责任校对 / 官 常

出版 /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(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)

(0451)2560814 邮编 150001

印刷 /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

发行 /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 / 787×1092 1/16

印张 / 52.25

字数 / 936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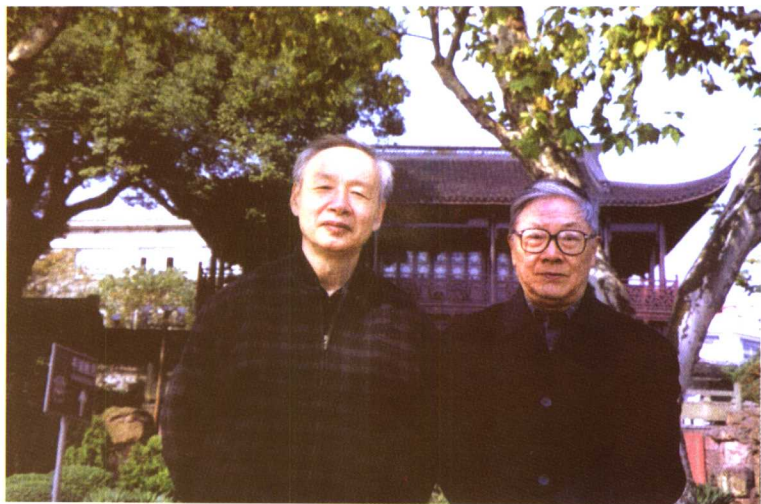
时间 /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

版次 /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/ 1-3 000

书号 / ISBN 7-5316-4124-0 / I·156

定价 / 100.00 元



欧阳健先生(左)与北京大学教授、古代小说研究专家侯忠义合影



欧阳健先生与红学家、贵州大学教授曲沐(左一)，著名作家克非(左二)、红学家吴国柱(右一)先生在一起。



●侯忠义

《还原脂砚斋》是一部评论著作。不过，它评论的不是作品本身，而是对作品评论的评论。具体地说，是对《红楼梦》的脂抄本及以脂砚斋为代表的评语的考证、辨伪和评价。为什么要对脂抄本与脂评重新审视呢？那是因为它们确有来路不明、面目不清、语言不当之嫌。廓清关于脂抄本和脂批的种种雾障，必将迎来红学研究的明朗的春天。

《红楼梦》的评点遗产，其实是十分丰富的，而我们的研究却很不够。《红楼梦》的评点史，自有它的体系和发展脉络，其中却不见脂砚斋的地位与影响。在程甲本之后，东观阁书坊于嘉庆十六年(1811)最先出版了评点的《红楼梦》，评语多达两千多条，基本上达到与文本融为一体的程度，涵盖了小说主题的把握、人物的品评及写作技巧的分析等，保持了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的基本格局，做到了文人自我欣赏和指导阅读的结合。在东观阁本之后，又相继出现了王希廉、姚燮、张新之、蝶梦仙史、刘履芬、黄小田等评点家，对于《红楼梦》的传播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。他们对《红楼梦》的评点，均以刻本的形式出现，且互相间多有参考和

借鉴,独独没有发现这些评本参考过脂批的直接证据,这对于号称出现在乾隆时期的各种脂抄本而言,难道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吗?

《还原脂砚斋》一书就回答了这个问题。此书是作者 1991 年提出的“脂本乃后出之伪本”,“脂砚斋乃出于后人之伪托”观点的基础上,对脂砚斋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。北京大学一位理科教授对我说:科学研究应该“不迷信书本,不迷信权威,不迷信传统”。我想,这话是符合科学发展实际的。本书作者不迷信权威,勇敢地向既定的成见发起挑战,提出了否定红学界维持了七八十年成见的新观点,实属难能可贵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本书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专著,它代表了当今红学的新水平。

作者的写作原则是,从事实出发,坚持实事求是、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,审视有关脂砚斋的全部材料,包括对三千六百多条脂批,毫不遗漏地逐条加以辨订;通过大量的资料和史实,对脂批的年代、性质和价值作出全面阐释,最后还原出一个真实的、具体的脂砚斋来,从而得出一个比较可靠的结论。此书论述缜密,辨析细腻,针对性强,颇富说服力。

认识真理需要一个过程,这个过程现在已经开始。经过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,为时不会很远。因此,我衷心欢迎《还原脂砚斋》的面世。是为序。

2003 年 2 月 4 日,时值羊年正月初四,立春,
于北京大学



序

● 曲 沐

欧阳健先生的红学巨著《还原脂砚斋》，经数年的努力，业已竣事，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程俊仁先生的赏识与关爱下，由该社隆重推出，快要和读者见面了，这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，也是红学界一件认真辨伪、警世除弊的大事，可喜可贺！

我曾经说过：欧阳健先生的“红学辨伪”，“实在是红学史上的里程碑，具有划时代的理论贡献”。他之贡献，主要在于揭穿了蛊倭红坛将近一个世纪的脂砚斋这个“大伪”的本质，保卫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《红楼梦》。著名作家徐迟曾经说过：“不批判这个祖师爷（脂砚斋），胡适就批不倒；批了脂砚斋，胡适不批也倒了。”（《红楼梦艺术论》）这话尽管带有“左”的余绪，但却说明了一个事实：脂砚斋确是胡适红学理论的大支柱，摧毁这个支柱，胡适整个红学理论大厦就会全然倾坍。我们并不否认胡适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，但他的《红楼梦》研究却是失误的，甚至还有一些“不完全出于轻信”的不解之谜。俞平伯曾说：“我看红学这东西，始终是上了胡适的当。”这话当没说错。

我们知道,“新红学”开山祖师的胡适 1921 年作《红楼梦考证》,提出“曹雪芹自叙传说”、“曹寅家世说”和“高鹗续书说”,这三大学说在当时并未形成“定于一尊”的全盛局面。况且这些学说是在批判“旧红学”尤其是蔡元培《石头记索隐》的背景下展开的,因之也受到蔡元培的抵制与诘难,这些诘难使胡适无以作答。所以,从 1921 年 5 月至 1927 年 8 月长达五六年的时间里,胡适的红学研究是一片空白。

1927 年,16 回残抄本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甲戌本出现了,由于这个本子的脂砚斋批语全面证实了胡适的三大学说,胡适遂将曾经否定了的这个“重评本”定为“海内最古的《石头记》抄本”,“曹雪芹原稿本的过录本”,从此,“新红学”的理论大厦即矗立起来。“这一‘巧合得令人蹊跷’的独特历史景观,可以让我们作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选择:其一,承认胡适的‘先知先觉’,他不是一般的凡人,能够‘未卜先知’世上尚有大量‘曹雪芹原稿本的过录本’存在,来证实他的基本假设是‘颠扑不破的真理’;其二,承认确有‘好事者’为了迎合胡适的需要,伪造或部分伪造了脂本脂批,给胡适红学观点提供有力的佐证。”(吴国柱:《胡适红学范式批判》,载《贵州大学学报》1998 年第 2 期)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,以欧阳健教授为首的一些有识之士摈弃前者而确认后者。

从甲戌本出笼的前前后后看,其一,它是在新旧红学大论争的智慧竞赛中产生的,卖主想方设法卖给胡适,真可谓“智慧出,有大伪”(《道德经》),它之伪就在它是“迎合胡适考证的需要”,以伪证来证实胡适的学说的。其二,人们皆忽略了甲戌本产生的社会状况:二十世纪之初的上海滩,藏污纳垢,人文背景十分复杂。就在民国十年前后,也就是甲戌本出现的前些时候,上海有些无聊文人掀起一股伪造“原本”、“秘籍”的恶浪。1997 年第 1 期《上海滩》杂志刊载的《旧上海出版商诈骗奇术》,披露了一些精心策划的伪造秘籍的奇案,最典型的莫过于著名的《申报》《新闻报》相继刊登广告宣传“关中发现‘武侯秘籍’”,曾经轰动一时,蒙骗了很多入,“再版十余次”,两个作伪者捞了一大笔钱。有正书局则不仅将《红楼梦》前八十回篡改加批后石印,打出《国初抄本原本红楼梦》的幌子,也将《聊斋志异》篡改加批后石印,打出《原本加批聊斋志异》的幌子向社会兜售(见杨海儒《有正本〈原本加批聊斋志异〉对原著的肆意篡改》,载于作者《蒲松龄生平著述考辨》)。这个有正本的《原本红楼梦》,蒙骗了很多入,其中就包括胡适、俞平伯和鲁迅,今天也还有人相信它。可惜的是,甲戌本卖书人的姓名被胡适掩盖起来,他人不知,无法清查。所以常人难以理解:为什么胡适将甲戌本秘藏了三十四年;为什么在人们一再追问下他就是不肯公开卖书人的真实姓名、地址和身份!这也是为什么 1961 年甲戌本影印出版后明眼人一下子就看出那么多破绽;这也是为什么 1995 年第 2 期《历史档案》公布了保存在胡适收

信的档案夹里的甲戌本卖书人胡星垣 1927 年 5 月 22 日写给胡适的信以后,人们才大吃一惊:原来胡适有意隐瞒!原来甲戌本的出现的的确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!——人们只能这样解释。

由于甲戌本的得逞,载有脂砚斋批语的庚辰本、己卯本也相继出现,胡适皆奉为真本,人们也跟着相信。然而,就是这些充斥着脂砚斋批语的脂本,却给红学界带来空前的灾难,它的最大危害就是否定和“糟蹋”已经流传两百余年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的一百二十回全璧本《红楼梦》。脂砚斋不仅篡改《红楼梦》的语言文字,篡改得“一团糟”、“一塌糊涂”,“乱七八糟,狼藉满纸”,批语“很少三句不带别字”,庚辰本“全书遣词造句,拖泥带水,粘皮搭骨,很少有几句话说得干净利落的,有时文理蹇涩,无论怎样连贯不下去”(台湾作家苏雪林);而且篡改《红楼梦》的人物形象,歪曲贾宝玉,歪曲林黛玉,歪曲芳官,歪曲尤三姐……还加进一些攻击少数民族的极端狭隘的语句。脂砚斋还为“自传说”提供伪证,什么“真是有是事,真是有是事”、“嫡有实事,非妄拥也”,什么“作者与余实实经过”,什么“凤姐点戏,脂砚执笔”等等,其实都是一些违背文学基本常识的胡说。他又为“曹寅家世说”提供伪证,曹雪芹明明不避讳“寅”字,他却胡说避讳“寅”字。他更为胡适“腰斩”《红楼梦》提供伪证,什么“书未成,芹为泪尽而逝”,其实就是套胡适“书未完而曹雪芹死了”的话头而来。又在二十二回批道:“此回未成而芹逝矣。”既然“书未成”,既然曹雪芹写了不足二十二回书,为什么又一再透露“佚稿”的内容,一再胡诌《红楼梦》的结局情节?所以脂砚斋的批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,极其严重地破坏了《红楼梦》的本来面貌。他的恶业还在于:由于其欺骗性,竟使得不少人如同“皓首穷经”那般“皓首穷脂”,到头来仍然是陷于一团迷雾。俞平伯曾经痛心地指出:“一切红学都是反《红楼梦》的。”这个“反《红楼梦》”的总根子就是脂砚斋。克非先生说:“脂砚斋有罪”(《红楼雾障》),其罪罄竹难书!宛情先生也说:“对于《红楼梦》来说,他(脂砚斋)是罪人,对于曹雪芹来说,他也是罪人。”(《脂砚斋言行质疑》)然而,就是这个作恶多端罄竹难书的脂砚斋,却受到红学家的顶礼膜拜。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,对脂砚斋的迷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。红学家们在“新红学”观念的牢笼下,将面目不清的脂砚斋奉为圣明,将来路不明的脂本奉为圭臬,将庸俗低劣的脂批奉为金科玉律,于是,红学界出现两个“凡是”:“凡是与脂砚斋观点不合的都错,凡是与脂砚斋提供的史实不符者都斥。呜呼,哀哉!”(朱伟杰《俗读红楼梦》沈仁康序)。“脂学”“曹学”“探佚学”相继出现,这些“学”的动机和目的便是否定程刊百二十回全璧本《红楼梦》。比如“探佚学”,根据脂砚斋一些别有用心的片言只语,对所谓《红楼梦》“佚稿”作出了想当然的五花八门的推测和猜想,其结论的离奇怪诞已经将《红楼梦》糟蹋得不成样子了。如今,脂砚斋的本子,根据脂

砚斋批语胡编的《红楼梦真故事》，充斥书肆，鱼目混珠，真假难辨，尤其贻误青少年，而真正的全璧本《红楼梦》却被“湮晦”了。这是令人痛心的。现在该是彻底清算脂砚斋的时候了。早在1979年，徐迟就尖锐地指出：脂砚斋“庸俗、轻薄、恶劣、凶狠，首先跳出来给《红楼梦》抹黑的就是他！只要不被偏见蒙蔽，任谁都能看透这个老奸巨滑”（《红楼梦艺术论》）。由于徐迟当时尚未看出脂本的晚出和脂砚斋的作伪，所以他那些深刻而尖锐的话并未引起更多的重视。

“江山代有才人出。”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初，欧阳健先生通过对脂本的详细考察，以大量确凿的事实证明“脂本乃后出之伪本，而程本方为《红楼梦》真本”，使红学界为之“震撼”。随之展开的真假《红楼梦》大论争，脂本真伪之大论争，程本与脂本孰先孰后孰优孰劣之大论争，这都是历史的必然。清代学者阮元有云：“学术盛衰，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。”以胡适为旗帜的“新红学”走过了将近百年的历史，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，由于其“观念”和“文献”的悖谬与失据，由于其错把奸佞当圣贤，错把脂砚斋当成好人，导致其终究要衰败的历史命运，这是必然的。一些卓犖的有识之士，终究会识破脂砚斋欺诈的本质，终究会起而捍卫国宝《红楼梦》，这也是历史的必然。所以二十世纪之末由欧阳健的红学辨伪所引发的这场学术大论争，它的意义就在于这是一场“大是大非”、有关《红楼梦》生死存亡的保卫战。脂砚斋这个“大伪”的骗局，脂砚斋对《红楼梦》所造成的危害，不能让其再继续下去了。只要你是热爱《红楼梦》的，就必然会痛恨脂砚斋，不能容忍脂砚斋；只要你知道了脂砚斋的危害，就会起而捍卫《红楼梦》。脂砚斋和曹雪芹，脂砚斋和《红楼梦》绝不能同时并存，要热爱和保卫《红楼梦》就得清除脂砚斋，只有清除脂砚斋，才能有效地保卫《红楼梦》，哪怕有些人至今尚未觉醒。

我也曾说过：欧阳健先生的红学辨伪，是出于一种崇高的感情，具有崇高的爱：爱曹雪芹的伟大天才，保卫其创作不被脂砚斋糟蹋与“抹黑”；爱全璧本《红楼梦》的艺术美质，保卫其完整性不被“新红学家”割裂和“腰斩”；爱且能理解程伟元的“苦心”，保卫其功绩不被胡适歪曲和抹煞。由于怀有崇高的感情和崇高的爱，他就有胆识“敢于在向来不发生问题的地方发生问题而不丧气于他人的攻击”（顾颉刚语）。如果说他的《红楼新辨》和《红学辨伪论》是在重重攻击中已经果决地揭开了脂砚斋的面纱，那么，《还原脂砚斋》这部坚实的力作，就是全面而彻底地揭露出脂砚斋的真实面孔，将他的本质展示在观众面前。正是“惩其恶稔之时，显其贯盈之数”（《文心雕龙》），使人人都知道脂砚斋之恶贯满盈，使他再也蒙骗不下去了。真理是不怕攻击的，我们欢迎具有实力的攻击，然而始终没有！我相信，若是还有什么“攻击”的话，也不会有什么扎实的力度，因为闭着眼睛不看事实的人毕竟是少数。

《还原脂砚斋》的最大特点是靠事实说话,充分尊重原始材料的客观性。所谓“原”,即是原始面貌和真实状态;“还原”,就是在详细清理文献的基础上,形成对历史原貌的活生生的体认。作者坚决摒弃“以论代史”和“观念先行”,更不作“大胆的假设”,完全遵循学术研究的客观规律,将自己先前的观点暂时搁置一边,一切从零开始,从源头开始,从根脚开始,直面有关脂砚斋的全部材料,原原本本地进行整理、鉴别、审查和分析工作。可谓“沿波讨源,虽幽必显;世远莫见其面,覩文辄见其心”(《文心雕龙》),循踪溯源,寻微探幽,深刻而清晰地探究出脂砚斋的方方面面,“还原”出一个真实的、具体的、任何人都会认可的脂砚斋。《还原脂砚斋》运用现代科技,真正将脂砚斋彻底“量化”了。它将甲戌本、己卯本、庚辰本的脂批全部汇总,每条批语都不放过,对脂砚斋的每一个问题,诸如脂砚斋的家世、秉性、素养、时代,都是根据全部有关脂批进行辨析;特别是“脂砚斋和曹雪芹”、“脂砚斋和红楼梦”、“脂砚斋和红学”等章节,通过“量化”,使人们看清了脂砚斋的本来面目:他不是曹雪芹的“同时人”和“至爱亲朋”;不是《红楼梦》创作的“知情者”“参与者”和“指挥者”。现代科技成果表明:“量化”是学术研究的必由之路,任何“质”的规定性,没有必要的“量化”是难有准确性可言的。从《还原脂砚斋》中我们会看到,脂砚斋没有任何逃匿的空隙,全部在作者的视野把握之中,不但靠“事实说话”,也靠数字化了的“量化说话”。这就使人觉得那些只靠攫取脂砚斋的片言只语,就在那里奢谈什么“曹学”“脂学”“探佚学”和“版本学”,是何等的肤浅与片面!真的要谈这些所谓的“学”吗?就请你好好看看《还原脂砚斋》,这才是真正的“曹学”“脂学”和“版本学”!应该说:这是“新红学”以来第一部真正将脂砚斋进行“量化”研究的学术著作,使你不服也得服,使你几乎再无游移的余地,这就是这部大书的力量所在,这才是真功夫、真本领、真知识、真学问。没有这些优良、过硬的学术素质,是写不出这部学术巨著的。

我也佩服作者思辨能力和审视能力之强。他发现脂批有两种类型:一种是脂本上所特有的脂批,一种是大量抄自有正本而署上“脂砚”“脂研”“指研”“脂斋”的批语。红学界都知道,有正本的批语多半是有正书局老板狄葆贤加的,也有聘请的“小说评点家”所加,这些都成了脂砚斋剽窃的对象。脂批实际上是脂砚斋意识的外化,从批语中可以看出脂砚斋意识的流动过程。人的意识分显意识和潜意识。当脂砚斋有意识为胡适提供伪证时,他就在脂本加了一些特有的脂批,这些脂批是极受红学家们青睐与尊崇的,然而恰恰就是这些脂批才是最最没有道理的,是最最违背文学基本常识的,他的辫子很容易被抓住。比如书中举到最常见的一条脂批“……再出一芹一脂”就极为不通,因为这时脂砚斋还没死,“再出一芹一脂”不就有两个脂砚斋了吗?类似这种“不通”“不合道理”者

比比皆是,人们都在不经意当中相信了,如今一经欧阳点破,才始觉大有恍然了悟之感。再比如,脂砚斋为了证实曹雪芹“自传说”“家史说”,就把自己打扮成“石头”和“宝玉”,于第27回眉批告诉人们他是“从《石头记》化来之人”,仿佛是曹雪芹也是贾宝玉活在世上批书改书,这显然是其显意识自觉的作伪行为,是在骗人,因为谁都不可能从《石头记》“化来”。可是,当他由于书中情节的感染,不自觉地下意识流露时,就会暴露出一些真实的情况。脂批中共用了45个“近”和“今”,这是针对“远”和“古”时的曹雪芹与《红楼梦》来说的。脂砚斋所肯定的“近之小说”中的“千伶百俐”和“这妮子”,作者举出八九种小说,都在《红楼梦》之后,脂批中用了17个“诸公”,他所批评的“诸公”,多是针对王希廉等评点派说的。脂砚斋所谓“重评”,不是自己第二次评,也是针对光绪年间评点派说的。有些批语如“闲闲”“叹叹”“特特”“伤心落泪”“不写之写”等袭之张竹坡;有的批语又是从1887年《梦痴说梦》引来的。这些发现和论证都是很有说服力的。所以根据脂砚斋抄袭1912年有正本判断,脂砚斋定在1912年之后;再根据脂本的出笼是为了“迎合”1921年胡适考证的需要判断,脂砚斋定在1921年之后。脂本是1927年出现的,则脂砚斋之作伪定在1921至1927年之间。俞平伯说过:“人人谈脂砚斋,他是何人,我们首先就不知道。”可见这个“红坛一怪”的脂砚斋,距离曹雪芹是很远很远的,毫不沾边。欧阳还用字迹辨别法,发现脂本上的批语有的是伪托的;“左绵痴道人”孙桐生三十多条眉批,笔迹根本就不是孙桐生的;甲戌本上刘铨福的跋,位置和布局均不合理,显然是后来所加;梦稿本上“兰墅阅过”,也是出自杨继振之手,梦稿本不是《红楼梦》稿本,也不是程伟元、高鹗修改过程中的稿本,更不是付刻的底稿。我向他询问:戚蓼生的“序”很可能是后人伪托,欧阳兄从“序”的内容和乾嘉学风等方面考察,认为伪托的可能性极大。此事尚“俟后之观者”。就是常被看重的支撑脂砚斋的《枣窗闲笔》,作者通过对“捐纳”制度的考察断其抄写制作在“光绪之后”;再对宜泉行止、服官、家世、宦宦生涯、任职情景的详细考察,廓清了《春柳堂诗稿》说之曹雪芹,肯定不是写《红楼梦》之曹雪芹,于“曹学”毫无价值。有正本第四回回前诗:“作者泪痕同我泪,燕山仍旧窦公无”,“窦公”为谁?红学界相互因袭,皆将“窦公”说成五代之窦禹钧,欧阳经仔细观察,指出实乃指东汉之窦宪,举证极为详尽,解决了作诗的批者是现代人的关键问题。这些都可以看出作者扎实的功力,发挥了作者在小说文献、小说版本研究方面的专长,对于有关“曹学”、“脂学”材料的证伪证实,都有非常新颖的见解,发前人之所未发。《还原脂砚斋》还有许多新的发现。最有趣的是脂批“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”,这条脂批太被红学家看重了,然而这个“造化主”却是现代词汇。欧阳吸收台湾刘广定先生的论见,使用现代“数字化”技术,并用《国学宝典》软件进行查找,查到中国

古籍两千多个“造化”，就是没有“造化主”一词，这个词汇最早是1902年梁启超在一篇文章中第一次使用的，从而证明刘广定先生的见解是正确的。欧阳还发现：脂批有十一个“阿凤正传”，这些“阿凤正传”都是仿效鲁迅1921年写的《阿Q正传》而来。

这些发现眼光十分锐利，真正是“褫其华衮，还其本相”，还原出一个“本相”的脂砚斋。脂本和脂批真可谓狼藉不堪，满纸涂鸦，胡适当年实在不该妄断三脂本的干支系年为“乾隆甲戌”“乾隆己卯”“乾隆庚辰”，此一错断，就误导了近百年，可悲、可笑又可叹！所以我十分钦佩《还原脂砚斋》资料之全和审视力之强，由事实所阐发的真理的颠扑不破。我还敬佩作者的气度之不凡。如实的展示，客观而冷静的分析，既无“情绪化”的偏颇，也不借机批判不同观点的人，更不作武断性的断语，决不使用“荒谬之至”、“不值一驳”之类无礼的用词。书中引用大量事实和例证，层层剥笋，步步推进的论证方式，自始至终让读者从事实和例证本身得到启发和教益，自然而然地接受书中的观点。

我也十分钦佩作者论证问题的准确性和生动性。《还原脂砚斋》尽管以文献资料取胜，但并不枯燥，读来是那样耐读，那样引人入胜。这不仅因其附有许多精妙的书影可供直观，就是论述文字也相当精彩。当我读到论述脂砚斋过录有正本批语时，书中历数其“错字”“夺字”“衍文”“增文”“避讳”等毛病，越看越爱看，特别在看到“避讳”一节，作者引用《中国古代避讳史》中史料，列举《乾隆朝上谕档》中记载王侯锡疏忽避讳在被砍头之前，刑部的审问记录，用这种“审问”格式“审问”曹雪芹，看看曹雪芹能否不怕砍头胆敢不避讳，能否通过刑部这一关，看到此处，简直使我忍俊不禁，笑个不住：为所引史料的清晰性和论证的准确性与生动性而高兴地发笑；也为那种以想当然代替学问，自以为是说什么小说可以不避讳，说什么曹雪芹有反封建思想可以不避讳，以此虚妄的意念来为脂砚斋圆谎的可笑而发笑。所以，这部书的精彩之处太多了，美不胜收。

这些年来，由于参与欧阳兄“红学辨伪”事业，感受良多。他之为人，他之学识，他之气度，他之胸襟，均使我深受感染和教益，尤其在他受到攻击与诋诬的时候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，处顺境而不骄，处逆境而不馁，表现出度量大、胸怀宽，总是站得高，看得远，不存芥蒂，不忌前嫌，并能从对立观点和反对文章中发现他人的长处，消除隔膜，化解敌意，寻求对话空间，因之常使我为之赞叹。其实，他的学术人生，常在逆境中涵泳，压力愈大文章愈富有光彩。我也很欣赏他的那些争辩文章；我想，如果没有经受“全面批驳”的洗礼，或许就没有《还原脂砚斋》这部恢弘而坚实的力著。而且我知道，《还原脂砚斋》都是在非“得意”的心境下写成的，他极善于将平时的“不快”和“压力”化成决心和力量，熔铸在学术的著述之中，与研究对象交成朋友，深入对象的“灵魂”深处，探究对象的究竟

和底里，废寝忘食，乐而忘忧，由是写出了这部光辉的著作。古人所谓“发愤所为作”，又云：“文章憎命达”，可能就是这个道理吧。

由是不由得想起我们的友谊，常使我感到温馨与怀想。1997年吴国柱兄、我与欧阳兄共同撰写《红学百年风云录》，我们合作的是那么默契和愉快。欧阳统领全局，扶疑开滞，为全书定下“立意要高，资料要全，气度要大”的基调，我们一致赞同并严格遵守；他反复告诫也要求我们既然是写史，就要冲淡“情绪化”，以包容的气度和平静的心态来观察和对待一切，力戒作绝对性断语，我和国柱自然从风景慕，学习他的榜样。国柱常说：“冲淡情绪化太难了”，我也有同感，但终究还是这样做了，如今回过头来想一想，真觉得欧阳学术风格和思想境界的高标与超群，确有大家风范。我也想起1996年与欧阳兄共同整理校注亚东本《红楼梦》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）的前前后后。我说：“这次以我为主，你就委屈一下了”，他是那样高兴而坦然地接受，合作的是那样默契和愉快，有谁能像欧阳那样宽厚和无私呢？我常想，一个人要是汲汲于个人得失，一点亏也吃不得，那是很难相处的，学术界因合作而翻脸者不乏有人；而我们和欧阳兄多年的合作，却是愈合作愈亲密、愈合作愈愉快，每次合作都留下许多值得感怀的友谊情结，这不能不说是欧阳人品的君子风度使之然也。让我们为欧阳《还原脂砚斋》这一新的学术成就而祝贺，也祝愿我们的友谊历久弥深！是为序。

2003年2月12日于
贵州大学百荃书屋



自序

红学是研究小说《红楼梦》的学问，又是一门不断演变发展的学问。不同的时代，有不同的红学。不同时代的学者，将赋予红学不同的内涵，并取得不同的研究成果。

徐兆玮《游戏报馆杂咏》云：“说部荒唐遣睡魔，黄车掌录恣搜罗。不谈新学谈红学，谁似蜗庐考索多？”自注：“都人士喜谈《石头记》，谓之红学。新政风行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；康梁事败，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。戊戌报章述之，以为笑噱。”（一粟：《红楼梦卷》第404页，中华书局1963年版）据李放《八旗画录》介绍，光绪初，京朝士大夫喜读《红楼梦》小说，且“自相矜为‘红学’”（《红楼梦卷》第26页）；当康有为、梁启超新政风行之时，喜谈“红学”的都人士都改谈起“经济”（其时之“经济”与今日之“政治”同义）来了；一旦维新变法宣告失败，趋时者又纷纷改谈远离政治的“红学”了。《游戏报》是李伯元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）在上海创办的第一张小报，“或托诸寓言，或涉诸讽咏，无非欲唤醒痴愚，破除烦恼”（《论〈游戏报〉之本意》），“戊戌报章”以此发为“笑噱”，在看重《红楼梦》政治历史意义的今人看来，显然是很难理

解的。——这就是十九世纪的红学。

1921年,胡适先生发表《红楼梦考证》,通过“作者”与“本子”的探考,构建了以“自叙传”为核心的“新红学”,将“红学”由士大夫的业馀爱好,提升为一本正经的大学问。然而,已经逝去的八十年,既是“现代红学”日趋兴盛的时期,又是不同观点“聚讼而如狱”的时期。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:与学术争鸣推动学科前进的普遍规律相反,各家各派都极为投入极为动情的红学论争,不仅没有解决包括作者生平、版本源流、文本解读在内的所有难题,反而使相互间的歧义越出越多。——这就是二十世纪的红学。

当新世纪、新千年降临之际,人们都企盼着红学出现全新的局面,至少是能走出那“越研究越糊涂”的怪圈。《红楼梦学刊》2000年第1辑《走进21世纪——部分红学家新世纪寄语》的笔谈,对新世纪红学抒发了美好的祝愿。然而,新千年的日历揭了一张又一张,红学界什么奇迹也没有出现。看来,想解开那烦人的“红学死结”,光有美好的意愿是不够的,还得从根本上下功夫才行。

二十世纪红学的问题在哪里?就在那位“人人谈讲脂砚斋,他是何人,我们首先就不知道”(俞平伯:《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引言》,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)的人身上。脂砚斋既是“新红学”的最大功臣,又是所有红学公案牵扯不清的症结所在。

胡适先生为新红学奠基的时候,他的体系尚处于“大胆假设”的状态。由于缺乏坚实文献的支撑,不仅受到传统型学者的顽强抵制,信奉向慕者亦甚为寥落。六年后的1927年8月12日,他忽然给钱玄同先生写了一封信,万分兴奋地报告说:“近日收到一部乾隆甲戌抄本的脂砚斋重评《石头记》,只剩十六回,却是奇遇!批者为曹雪芹的本家,与雪芹是好朋友。其中墨评作于雪芹生时,朱批作于他死后。有许多处可以供史料。有一条说雪芹死于壬午除夕。此可以改正我的甲申说。敦敏的挽诗作于甲申(或编在甲申),在壬午除夕之后一年多。(也许是‘成仁周年’作的!)又第十三回可卿之死,久成疑案。此本上可以考见原回目作‘秦可卿淫丧天香楼’,后来全删去天香楼一节,约占全回三之一。今本尚留‘又在天香楼上另设一坛(醮)’一句,其‘天香楼’三字上不着天,下不着地,今始知为删削剩馀之语。此外尚有许多可贵的材料,可以证明我与平伯、颉刚的主张。此为近来一大喜事,故远道奉告。”(《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》第147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)由于得到脂砚斋的支持,“新红学”的大厦方才真正矗立起来。非怪到了1961年,胡适先生还满怀深情地说:“我们现在回头检看这四十年以来我们用新眼光、新方法搜集史料来做‘《红楼梦》的新研究’总成绩,我不能不承认这个脂砚斋甲戌本《石头记》是最近四十年内‘新红学’的一件划时代的新发现。”(《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》第317页)

当代的红学家对脂砚斋更是推崇备至。周汝昌先生提倡的“真正红学”的四大支——曹学、版本学、探佚学和脂学，都依恃于脂砚斋的绝对权威；冯其庸先生对脂砚斋也有极高评价：“《石头记》最早以抄本形式流通于世时，就是以‘脂砚斋重评’的名字流传的，再往前一步讲，曹雪芹在写作《石头记》时，就是有脂砚斋参予的，所以研究《石头记》的人，没有不知道脂砚斋的，可以说，脂砚斋与《石头记》的关系，仅仅次于它的作者曹雪芹。脂砚斋不仅仅是因为他参予过《石头记》的写作和修改而显得重要，更重要的是他是《石头记》最早的评论者，而且他最知作者的底里。”冯先生将脂评的重要性概括为：1、脂评透露了作者的家世；2、脂评透露了作者创作、修改的情况和所写的某些本事；3、脂评透露了《石头记》八十回以后的某些情节；4、脂评突破了传统的文艺思想，提出了朦胧的文艺典型论；5、脂评作者本身还兼有一定程度的作者的身份，兼有小说情节和人物的素材的身份，也即是过来人的身份：“由于脂评的这种特殊重要性，所以它在《红楼梦》研究中，自然就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了。”（《石头记脂本研究》第14~28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）

脂砚斋对“新红学”体系既如此重要，我的第一篇质疑文稿在《复旦学报》1991年第5期发表后，立刻受到了红学界的由衷反对。宋谋瑒先生说：“他说脂砚斋出于伪托，倒使我大吃一惊：难道胡适、俞平伯、吴世昌、周汝昌等人辛苦几十年，竟是落入了某一个学术骗子的迷魂阵，闹了一场天大的笑话吗？”（《脂砚斋能出于刘铨福的伪托吗？》，《红楼梦学刊》1993年第3辑）光之先生说：“欧阳健不仅通通否认了脂批及其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；而且连我们至今看到的具有可贵价值的《红楼梦》早期抄本，都一下子贬成为废纸。脂砚斋更大倒其霉，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全破坏了。”（《关于脂评及脂本的“辨析”问题》，《红楼》1994年第3期）贾穗先生则说：“打个比方说，欧阳健先生算是扔给了红学界一颗当量颇不小的原子弹，冉冉爆炸，连站在红学这片土地最边缘的人，也足以感受到其强大的冲击力，这自非小事，谁都不敢等闲视之。”（《红学考据三议》，《红楼》1994年第4期）想起新红学开创者顾颉刚先生说过，他有“敢于在向来不发生问题的地方发生问题而不丧气于他人的攻击”的勇气（《顾颉刚选集》第77页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），对自己这种“不合时宜”的举动，我也毫不后悔与懊丧。我坚信，有关脂砚斋的争论不光是红学的“热点”，而且是红学的重点，是谁也甭想绕开的红学的最大关键。二十世纪的红学公案成千累百，脂砚斋却是公案中的公案，千百公案中最大的公案。试看形形色色的“红学热点”，有谁不借脂砚斋以为护法？又有谁不是附着在脂砚斋“皮”上的“毛”？不对脂砚斋进行全面彻底的清点，所有红学是非都不可能得到起码的澄清。

时间转瞬过去了十二年，只要对世纪之交的红学苑地稍作扫描，便可感知